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 研究丛刊

(第七辑)

✿ 甘肃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

(第七辑)

2010



二 州 城 中 子 阮 主办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

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

中国·兰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 第7辑 / 杨玲, 朱忠元
主编.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423-2351-4

I. ①中... II. ①杨... ②朱... III. ①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丛刊②古代戏曲—研究—中国—丛刊 IV.
①I207.41-55②J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2522 号

责任编辑: 吴洁琼

封面设计: 徐晋林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第七辑)

杨玲, 朱忠元 主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1 字数 300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5423-2351-4

定价: 30.00 元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

顾问:

- 赵逵夫** 教授(甘肃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西北师大文学院博导)
- 张文轩** 教授(甘肃省文联副主席、兰州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
- 宁希元** 教授(兰州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戏曲学会顾问)
- 王兴隆** 教授(兰州城市学院党委书记)
- 孔庆浩** 教授(甘肃文联副主席、兰州城市学院院长)
- 刘举科** 教授(甘肃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兰州城市学院副院长)

编委:

- 黄强** 编审(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特邀)
- 董汉河** 编审(《甘肃社会科学》前主编、特邀)
- 胡小鹏** 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特邀)
- 王登渤** 剧作家(甘肃省文联副秘书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特邀)
- 王人恩** 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福建集美大学中文系、特邀)
- 王光辉** 编审(甘肃教育出版社社长、特邀)

名誉主编: 宋子俊

主 编: 杨 玲 朱忠元

副 主 编: 王 萍

目录

(第七辑)

综合研究

- 苗怀民 大辘椎轮,创始不易
——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 3

古代戏曲研究

- 吴新雷 《紫钗记》昆曲演唱史略 19
- 李占鹏 明刻潮州戏文五种的发现、整理及研究 29
- 刘文峰 论地方戏的形成规律与传承机制 42
- 徐柏森 古代是谁在挑头演大戏? 64
- 吴 民 从《陶庵梦忆》看明末戏曲生态与审美取向 74
- 王家东 饱和化与经典化
——论元末开始的杂剧创作减少的原因 87
- 李晓梅 元杂剧中医者形象之再讨论
——试从元杂剧中医者形象看传统汉医学在元代的发展 101

红楼梦研究

- 宋子俊 简论《红楼梦》小说的历史与文化属性
——《红楼楼》与中国传统文化系列论文之三 113

出 主 刊

版 办 名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
兰州城市学院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
甘肃教育出版社

目录

（第七辑）

秦 川	《红楼梦》中的教育问题探析 ——重读经典《红楼梦》	130
康 宁	谈《红楼梦》中的“美中不足”	144
鲁彩苹	红楼梦对死亡的审视	156

古代小说研究

张同胜	《西游记》的成书与俗讲、说话	167
张春红	《拾遗记》创作的史学化特征	187
阳 清	魏晋六朝鬼神叙事中的“召命”范型	196
金艳霞	论猪八戒形象塑造的美丑辩证艺术	207
郭 丽	记梦作品的演进 ——从《诗经》到《聊斋志异》	220
孙董霞	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志怪情结 ——兼论志怪、小说、历史之关系	226
李海浪	浅析唐传奇中文人士子与妓女的爱情	242
周海锋	《世说新语》妇女形象新探	252
高 原	亦有“流芳”处的桓温 ——《世说新语》人物小品	260
杨 玲	杨天强 义与忠孝的悖反 ——“三言”中过度友情叙写及其原因探析	279
宋运娜	由《金瓶梅》主要人物结局解读《四贪词》之寓意	289
申重实	陈梓歆 论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传播方式	297

通
信
地
址
:
邮
政
编
码
:
电
话
:

兰州市安宁区兰州城市学院（校本部）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
0931-7601392
730070

目录

(第七辑)

- 郑炜华 论蒲松龄人生痛苦的来源 304

地方说唱艺术

- 张彦丽 兰州鼓子的方言民俗与生态环境略探 317

新著序评

- 朱忠元 外部研究的魅力
——评王萍新著《京剧老生流派崛起的社会心理研究》
327

- 王学锋 京剧老生流派的时代表征
——王萍《京剧老生流派崛起的社会心理研究》读后
337

古典名著普及

- 彭亚娟 田有余 中学生四大名著阅读现状及对应教学策略
343

会议综述

- 旧学商量加邃密
——第八届中国古代戏曲学术研讨会综述 361

出 主 刊

版 办 名

中国 古代 小说 戏剧 研究 丛刊
兰州 城市 学院
中国 古代 小说 戏剧 研究所
甘肃 教育 出版社

目录

编后记等

编后记	373
投稿须知	375

(第七辑)

通信地址：
电话：
邮政编码：

兰州市安宁区兰州城市学院(校本部)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
0931-7601392
730070

综
合
研
究

大辘椎轮,创始不易

——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

苗怀明

虽然从事戏曲研究的时间并不长,前后算起来也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但王国维先声夺人,成绩卓著,在中国戏曲研究史上谱写了十分精彩的篇章,成为这门学科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他以自己原创性的研究开创了一个学术文化的新时代,正如一位学人所概括的:“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1]

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功固然有其个人努力的因素,同时也与他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想全面、深入了解王国维的治学历程、学术成就、特色以及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必须将其放到这个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这句话用在王国维身上也是十分贴切的。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是时代的变迁为王国维提供了成为中国戏曲史学开山祖师的机会,是个人的努力使他具备了开创学术文化新时代的优秀素质,时代的机遇和个人的努力有机结合,成就了一位开疆拓土的学术文化英雄。

—

尽管生活在一个局势多变、动荡复杂的年代里,王国维的生平经历却相当平淡,没有什么传奇色彩的事迹,那些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历史事件基本上都与他无关,这似乎有些不符合乱世出英雄的常理。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学者,一生大部

分时间是在书斋中讨生活,其兴趣也主要在治学方面。他的门生周传儒对此曾有过十分准确的概括:“静安先生一生都在学习,都在进步,在自沉之前,从未停顿过。不搞政治,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广交游,不慕荣华,不图享受。全心全意治学,自幼至老,不离书本,粹然学者。学问是他的全部工作,全部事业,因而渊博、深沉、精到、突出,工具多,方法巧,做出了巨大贡献。”^[2]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王国维对学术研究自身价值及特性的认知颇与当时的学人不同:“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3]他还曾说过这样的话:“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4]由此不难看出王国维的人生取向和价值标准。这样的见解即使在今天也很有现实感,让身受政治或商业因素困扰的学人感慨不已。

由于王国维平生治学涉及领域较广,建树颇多,这里只谈其戏曲研究的一个方面。从王国维一生的治学经历来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治学兴趣及特点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以下结合戏曲研究的情况将其一生治学历程分成如下三个阶段。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与人们通常的认知有所不同。

从1898年到上海《时务报》担任书记至1903年为第一阶段。此前,王国维与同时代的其他读书人一样,遵照学而优则仕的古训,想走科举应试之路,早年虽曾考中秀才,但随后两次参加乡试都失利了。可以想象,如果王国维乡试成功的话,中国历史上不过多了一个普通的官僚而已,但学术史上却少了一位开山的大师。有趣的是,当时就连其父亲都不看好自己的儿子:“真是无筹算计,无识见无才用。大恨,谴责之。胸中磊磊,若是安望成家,吾复何望,及夜不安。”^[5]

在准备应试之外,王国维还在诗文、经史上下了不少工夫,读了不少书。当时的情况正如其弟子徐中舒所概括的:“二十二以前居海宁本籍,治举子业兼治骈散文。”^[6]是1898年的上海之行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成为其治学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

在这几年时间里,王国维的兴趣主要在哲学方面。他对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有着特别的兴趣,曾下过比较大的工夫进行研习,有许多个人独到的体会。据当时一位日本学人的观察:“中国青年中的志学者,大都对政治学、经济学有兴趣,所谓有志新学而尝试研究西洋哲学的,非常罕见。”^[7]其间,王国维还学习了日文、英文和德文,并研修数理化等课程,借此得以阅读不少西方自然、社科著作。这种西学素养和知识结构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并不多见,它奠定了王国维日后学术事业的基础。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到上海不久,王国维即与罗振玉结识,并受到罗振玉的赏识和帮助,两人的密切交往与合作对王国维的人生道路及治学历程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对两人较为复杂的关系,研究者多有探讨,评价不一,此不赘述。

对西学的精通为王国维日后的治学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首先表现为新的学术文化观念的形成。比如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为体既卑,为时尤近,学士大夫论之者颇少”^[8],而王国维却能给予特别的重视,当做一门严肃的学问进行研究,与旧式文人的轻视形成鲜明对比。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能不能为的学养能力问题,而是一个愿不愿为的观念问题,这正如王国维本人所说的:“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9]

这其次表现为视野的开阔。由于对西学的精通,故时能从世界文学乃至文化的角度来观照本民族文学艺术的诸种特性。较之前人的研究,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可以说是开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

这再次表现为科学缜密的思维方式,即对研究对象宏观着眼,微观入手。梁启超对王国维治学的这一特点十分欣赏,将其概括为“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他同时又指出这得益于王国维早年的哲学训练:“其少年喜谭哲学,又酷嗜德意志人康德、叔本华、尼采之书,晚虽弃置不甚治,然于学术之整个

不可分的理想,印刻甚深,故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已守残之蔽。”^[10]这段话即使是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良好的西学素养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使王国维与其前辈学者比如乾嘉学派诸人相比,有着自己的学术优势。可以说,没有这个时期的学术训练和充分准备,就不会有他后来包括戏曲研究在内的巨大学术成就。一位学术大师的成功并非偶然,从王国维的治学历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从1904年撰写《红楼梦评论》到1913年完成《宋元戏曲考》,这是王国维治学历程的第二阶段。虽然只有短短九年的时间,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收获期。在这十年时间里,王国维的兴趣从哲学转到文学,在诗词、小说、戏曲等领域皆有开拓性的贡献,其代表著作《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等皆写于这一时期。其在文艺研究领域的建树及特点正如陈寅恪所总结的:“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是也。”^[11]

可惜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王国维很快便转入史学研究,而且转得非常彻底。否则依其深厚的功力,良好的学养,是可以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更多更大成就的。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人的得失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换个角度,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

1913年之后,随着政治文化环境的改变,受罗振玉的影响,王国维结束了其对文学艺术的探讨,从此转入史学研究,开始了其治学历程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王国维治学“已入自创时代”^[12],达到其学术事业的顶峰,在甲骨学、金文学、简牍学、敦煌学等领域全面丰收,作出许多开拓性的贡献,成为学界公认的一代宗师。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以投湖自杀的方式中断了自己的生命,也结束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对于此举内在的动机,人们作

出了许多推测,可谓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成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

王国维一生治学从哲学转向文学,从文学转向史学,之所以发生两次大的学术转向,与其所处的时代文化环境有关,也与他个人的秉性和心态有关,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对此问题叶嘉莹在其《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一书中有深入、精彩的分析,可参看,此不赘述。

二

王国维研究戏曲是从 1907 年经罗振玉举荐到北京学部及京师图书馆任职之后才开始的。此前,他对戏曲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之所以要专门进行探究,主要有如下两个因素:

一是因词的创作、研究成功而涉及戏曲,即他本人所说的“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词曲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词的深入探讨,势必会涉及曲,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学术转向。

一是为了振兴戏曲。当时戏曲、话剧在中国与西洋文化地位的巨大反差,雅部戏曲的衰落,使他意识到“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中国戏曲中虽有佳者,但“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13]。无论是由词而曲,还是为了振兴戏曲,更多的是出于自觉的学术目的。

此外,当时北京浓厚的戏曲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他,激发了其探讨的兴趣。这一时期正是京剧发展成熟并达到鼎盛的重要时期,名家辈出,演出频繁,上至皇帝后妃,下至平民百姓,无不迷恋,达到举城若狂的程度。

在此后短短几年间,王国维不断有戏曲著述面世:

1908 年:《曲录》。

1909 年:《戏曲考原》《优语录》《唐宋大曲考》。

1910年:《曲录余谈》《录鬼簿校注》。

1911年:《古剧脚色考》。

1913年:《宋元戏曲考》。

据说王国维还著有《曲调源流表》，但原稿佚失，现在已不可见。此外，他还曾帮助罗振玉影印出版《元刊杂剧三十种》。1914年，他“取其最佳者，重为写定”^[14]，整理了《七里滩》《拜月亭》《三夺槊》《贬夜郎》四个剧目，表现出对新发现戏曲文献的浓厚兴趣。

从上述著述来看，王国维的探讨涉及戏曲学科的各个分支，从戏曲目录的编制到戏曲源头的考索，从基本典籍的校勘到演员资料的收集，从戏曲宫调的考察到戏曲角色的追溯，等等，无不在其探讨之列，其中不少工作具有开创空白的重要意义。这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首次以自觉的学术意识对戏曲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与先前文人士大夫那种即兴式的曲话体写作无论是在学术思路、治学方法上还是在表述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王国维的戏曲探讨是从文献的收集、整理这一基础工作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先前正统文人视戏曲为小道，相关的学术积累较少，文献散失严重，没有图书馆提供文献支持，缺少同道之间的切磋，这就需要从最为基本的文献研究工作着手。这一情况正如傅斯年所描述的：“剧本散亡，剧故沉湮，源源不可得考，事迹无从疏证者，多多矣。钩沉稽遗，亦大不易。当时人并无论此之专书；若于各家著述中散漫求之，势不能不遍阅唐宋元明文籍，然而唐宋元明文籍，浩如烟海，如何寻其端绪？纵能求得断烂材料，而此材料又复七散八落，不相联属，犹无补也。王先生此书，取材不易，整理尤难。”^[15]没有文献搜集、整理这一基础工作，戏曲研究就无法展开。不仅王国维如此，同一时期及其后的其他研究者也都十分重视戏曲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这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戏曲研究的重要特色，其成就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也与王国维个人的治学兴趣及特点有关。为研究的需要,王国维购买了不少珍贵的戏曲典籍,如《盛明杂剧》初集、《雍熙乐府》、《传奇汇考》及明文林阁传奇十种等。他喜欢实证式研究,是以治经史的方法来研究戏曲的,即先从目录、版本、校勘着手,使研究建立在丰富、坚实的文献基础上。以《曲录》的编制为例,这是王国维着手戏曲研究的第一项工作。由于“正史艺文志及《四库全书提要》,于戏曲一门,既未著录;海内藏书家,亦罕有蒐罗者”,于是他“参考诸书并各种曲谱及藏书家目录,共得二千二百二十本,视黄氏之目增逾一倍。又就曲家姓名可考者考之,可补者补之,粗为排比,成书二卷”^[16]。后稍作增补修改,“为书六卷,为目三千有奇,非徒为考镜之资,亦欲作搜讨之助”^[17]。有了完备、可信的目录,就可以对戏曲有全貌式的了解,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使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学术起点与平台。

正是由于准备的充分和工作的扎实,王国维在撰写《宋元戏曲史》一书时才显得十分自信和从容:“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18]这并非虚言,而是实际情况的写照。

在上述著述中,以《宋元戏曲史》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它可以看做是王国维数年戏曲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正如蔡尚思所言:“王国维生平著述很多,但就其系统性而论,却首推《宋元戏曲史》一书。”^[19]他本人也是这样看的:“四五年中研究所得,手所疏记,心所储藏者,借此得编成一书。”^[20]该书原名《宋元戏曲史》,后改名《宋元戏曲考》,写于1912年末1913年初,“乃以三月之力,写为此书”^[21]。

据徐森玉回忆,他曾拜访过撰写《宋元戏曲史》期间的王国维,当时所见:“桌上、书架上摆的都是有关这部书的资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从日本收来的善本。我们聊天时,他总把话头引到这部书上来,听取我的意见。这时,另有一位朋友来看他,他还是用此法谈话,有时提出问题和我们研究,如有相反的意见,